

桂
堂
文
库

朱立立 | 著

阅读华文离散叙事

YUEDU HUAWEN LISAN XUSHI

 人 民 出 版 社

阅读华文离散叙事

朱立立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詹素娟

封面设计:周涛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华文离散叙事/朱立立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

ISBN 978-7-01-014225-8

I. ①阅… II. ①朱… III. ①华文文学-文学研究-世界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0609 号

阅读华文离散叙事

YUEDU HUAWEN LISAN XUSHI

朱立立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

字数:345 千字

ISBN 978-7-01-014225-8 定价:5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桂堂文库

排序按作者姓氏笔画：

孙绍振《文学的坚守与理论的突围》

朱立立《阅读与文网散叙事》

汪文顶《现代散文学初探》

南帆《表述与意义生产》

郑家建《透亮的纸窗》

姚春树《中国现代杂文散文杂论》

席扬《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典型现象”》

辜也平《多维牵掣下的苦心雕镂》

葛桂录《经典重释与中外文学关系新垦拓》

赖瑞云《文本解读与多元有界》

潘新和《“表现—存在论”语文学视界》



序

福建师范大学是一所百年学府,肇始于1907年由清末帝师陈宝琛先生创立的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开示福建高等教育的先河和师范教育的优良传统,又承传1908年筹设的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1915年兴办的福建协和大学两所教会大学的学科积淀,历经百年建设,发展成为东南名校。

我校中文系与校史一样源远流长,主要由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国文科、协和大学与华南女院等中文系科发展而来,于2000年改设文学院,现包括中国语言文学、秘书学和文化产业管理三系。文学院的学术源流,既呈现了陈宝琛、陈易园、严叔夏、董作宾、黄寿祺诸先贤奠定的传统国学,又涵衍着叶圣陶、郭绍虞、章靳以、胡山源、俞元桂等名家开拓的现代新学,堪称新旧交融,底蕴深厚。其中,长期为学科建设殚精竭虑而贡献卓著者,当推前后执掌中文系务三十年的经学宗师黄寿祺(号六庵)教授和现代文学史家俞元桂(号桂堂)教授。

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进程,我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稳步发展,屡有创获。由六庵先生和桂堂先生分别领衔的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于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1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全国首批硕士点;1995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由国家教委确认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8年一举获得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两个博士点,2000年又获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点,2001年设立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3年获取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2007年中国现当代文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此外,还有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博士

授予权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国家级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教学团队各1个和精品课程4门,综合实力居全国同类院系的先进行列。

先师桂堂先生,1942年毕业于协和大学,系国学名师陈易园、严叔夏先生之高足;1943年考入中山大学研究院中国语言文学部,又师从文献学家李笠教授和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1946年获文学硕士后,受严复哲嗣叔夏先生举荐回母校执教,直至退休。1956年起任中文系副主任,协助六庵先生操持系务,1979年接任系主任,至1984年卸任。先生从教五十年,早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史,1951年起奉命转治现代文学,晚年创立现代散文研究方向,著有《中国现代散文史》、《桂堂述学》及散文集《晚晴漫步》、《晓月摇情》等,与六庵先生同为我校中文学科德高望重的鸿儒硕老。文学院此次策划出版两套学术文库,分别以两位先师的别号命名,不止为缅怀先师功德,更有传承光大学术门风的深长意味。

《桂堂文库》首批辑录11种,均来自我校现代文学学科群三代学者,包括文艺学、比较文学和语文教育学等学科。老一辈名师中,孙绍振教授以《文学的坚守与理论的突围》汇集他在中外文论、文艺美学和文本解读方面的精品力作,姚春树教授则以《中国现代杂文散文杂论》显示精鉴博识的特色。中年专家有6种,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南帆的《表述与意义生产》畅论当代文论和文学研究的前沿关键问题,辜也平的《多维牵掣下的苦心雕镂》在巴金研究和传记文学探索上有所创获,席扬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典型现象”》中阐发学科史和思潮史的新见,潘新和专门论述《“表现—存在论”语文学视界》,赖瑞云则细心探讨文学教育的《文本解读与多元有界》的理论与实践,拙作《现代散文学初探》只是附骥而已。新一代学人有郑家建的《透亮的纸窗》、葛桂录的《经典重释与中外文学关系新垦拓》和朱立立的《阅读华文离散叙事》,在各自领域显示学术锐气。原作俱在,可集中检阅我们学科建设的部分成果和治学风气,我作为当事人不宜在此饶舌,还是由读者独立阅读和评议吧。

汪文顶

二〇一四年夏于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精神私史

庶民认同、民族叙事与知识分子形象

——杨逵日据时期的文学书写 / 3

台湾知识人的精神私史：《背海的人》中的“爷” / 23

时间之伤与个体存在的焦虑——试论白先勇小说的时间哲学 / 34

荒谬境遇中的自我抉择和伦理考辨

——七等生小说的精神现象分析 / 47

台湾文学浪漫性的个案研究——七等生小说浪漫精神辨析 / 59

“绝地求生”与“困兽之斗”

——从精神史角度看王文兴小说的私语奇观 / 72

台湾新世代都市小说初论 / 84

神话的建构与解构：解读林耀德小说《一九四七·高砂百合》 / 92

物化都市的感觉主义书写

——解严后朱天文短篇小说的身体叙事与颓废意识 / 100

第二辑 离散叙事

漫游·时间寓言·语言乌托邦

——解读《海东青》的多重方法 / 111

台湾旅美文群文学创作中的认同问题浅论 / 126

白先勇笔下“纽约客”的认同危机与历史性视野 / 133

2 阅读华文离散叙事

《桑青与桃红》中的国族寓言与离散华人女性 / 145

民族国家意识与个体生命选择

——从认同视角看於梨华、丛甦、陈若曦、张系国的小说 / 159

忧郁的心灵镜像与诗性的美学救赎

——郭松莱、李渝的文学世界初探 / 175

漫游叙事与都市人的精神突围

——品析马森长篇小说《夜游》中自由的滋味 / 189

边缘人生与历史症结:简论严歌苓的《海那边》和《人寰》 / 199

异域与原乡之间的华人女性

——裴在美小说《阿幸与阿变》读析 / 206

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非马诗歌的意象世界 / 213

原乡迷思与边陲叙述——从散文看马华新生代作家的散文书写 / 227

马华新生代作家的历史书写及属性意识 / 241

第三辑 思潮与论争

从存在主义思潮的引进看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化场域 / 255

浪漫主义与60年代台湾文学思潮 / 269

台湾都市小说研究的理路辨析 / 278

殖民体制下的“台湾民族主义”?

——从藤井省三的《台湾文学这一百年》及相关论争谈起 / 293

对“鲁迅与台湾文学关系”相关论述的质疑 / 306

90年代以来台湾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 / 316

意识形态与文化研究的偏执——评周蕾的《写在家国以外》 / 325

视觉现代性与第五代电影的民族志阐释

——以周蕾的《原初的激情》为中心 / 338

后记 / 346

第一辑 精神私史

庶民认同、民族叙事与知识分子形象

——杨逵日据时期的文学书写

一、引言：庶民身份的自我认同

杨逵以其文学书写,鲜明强烈地表达了坚定的国族观念、阶级意识和民主思想。在台湾文学的历史书写中,杨逵作为一位具有鲜明阶级意识和民族抗争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一位具有反抗意识的殖民地台湾知识分子,一直被定位于台湾左翼文学谱系中加以叙述。这一点,不仅普遍体现于中国大陆出版的多种文学史叙事中,台湾地区的诸多论著对此也有相似的认知。

有趣的是,杨逵本人并不完全认同于自己的作家身份乃至知识分子身份。晚年的杨逵在一次访谈中曾说:“我蒔花已近四十五年;在东京,我送过报,做过土木零工;台湾的运动瓦解后,我又干过各种活,最后进入园丁生活。我写文章,但不把自己说成是作家,而自称为‘园丁’。我写文章的量很少,因此,打开头起就没有过靠笔杆子生活的念头。”^①这次访谈中他甚至拒绝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说:“我不曾把自己介入在知识分子的地位中,也没有那种自我意识和自负感。……我同知识分子交往,但我不能溺于知识分子的名

^① 戴国辉、若林正丈:《台湾老社会运动家的回忆与展望——杨逵关于日本、台湾、中国大陆的谈话记录》,台湾《文季》第2卷第5期,1985年。

分。”这种排拒知识分子名分的明确自我认知,使杨逵的身份认同问题变得有些意味深长。

“身份认同”(identity)是一个涵义丰富的概念,是主体对自身的一种认知、确认和描述,包括文化认同、民族国家认同、性别认同、阶级/阶层认同等诸多层面。杨逵拒绝的是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所谓“名分”。这一拒绝,让我们更深刻地看到杨逵在思想认知、情感结构和精神皈依上朴实的庶民色彩——对庶民身份坚定的自我认同。

1905年杨逵出生于台南一个手工业工人家庭。1924年他留学东京,在日本大学专门部文学艺能科夜间部工读,接受日本左翼思潮的影响,参加由台湾青年会设立的左翼政治团体“社会科学研究部”,介入东京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使他逐渐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一员。1927年,杨逵受到台湾文化协会的召唤,放弃学业回到台湾,投身农民组合运动,担任中央委员,负责政治、组织和教育三部门,在组织特别行动队、发动农民抗争活动中,先后十次被捕入狱,成为一名活跃的社会运动家。30年代以后,当农民运动退潮,归隐农园以“首阳”明志的杨逵,转而以文学创作继续表达自己的理想与抗争,写出了像《送报夫》《模范村》《泥娃娃》《鹅妈妈出嫁》等一系列经典作品,奠定了他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杨逵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了四十年,终其一生,工人、农民的庶民生活,是杨逵持久的日常生活样态。建立在农工生活体验基础上的知识实践和社会实践,不仅为杨逵投身社会运动带来崇高的使命感,更赋予他的创作以来自底层人生的真实力量,成为日据时期最具抗争力的文学典范。

底层庶民的生存经验和本色情感,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和理想主义色彩,二者构成了杨逵作为社会运动家的精神支柱,升华为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自觉力量。文学只是杨逵参与社会运动的别一种方式。这正是杨逵迥异于其他一些作家的根本所在。在“作家”和“社会运动家”这两种身份中,历史学者尹章义甚至主张:“作家”不过是杨逵的兼职,文学不过是杨逵的影子,文学是为其生命理想打先锋、为其实践生活做记录的工具。^①这样

^① 尹章义:《杨逵与台湾农民运动》,尹章义《台湾近代史论》,台北:自立晚报社1986年版,第76页。

的观点提示了“社会运动家”在杨逵多重身份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性。事实表明,文学书写不仅是杨逵底层庶民人生和社会运动的记录工具,更是杨逵左翼社会实践遭遇挫折后的一种战略转移,他最终也是在文学世界里复活和延伸了自己遭受挫折的社会理想和信仰。在这个意义上,杨逵的“作家”和“社会运动家”的身份是合而为一的,不了解社会活动家杨逵的农民运动经验,就很难理解作家杨逵整个文学创作的思想根基。

庶民、左翼知识分子以及社会运动家的多重身份,使杨逵的文学必然是有立场的文学,是主体性强烈投射其中的文学。杨逵在日据时代的文学创作,是他庶民体验和社会实践的另一种表征,见证了一个忠实于民族身份和庶民立场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呈现出一个在挫折中持恒、坚毅与乐观的社会运动家的强健自我。杨逵立足于弱势族群的底层立场,发出殖民地台湾不屈的抗争之声,成为日据时期台湾庶民阶层的代言人和反抗文学的一面旗帜。

可以说,知识分子身份与庶民认同的结合,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统一,左翼社会批判精神与理想主义情怀的交融,坚忍顽强不妥协的反抗品格,这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杨逵精神,这也是殖民地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石;自此出发,才能深刻理解杨逵文学世界独特情感结构和精神价值。

二、记忆政治：杨逵日据时期的文学书写

（一）以文学书写解构殖民叙事：杨逵创作动机溯源

杨逵早年有感于殖民者编造、歪曲历史叙事,乃萌发写作冲动。通过文学叙事来书写和保存被殖民者的庶民记忆,并解构日本殖民者的历史话语,成为创作的最初动机。杨逵曾多次回忆他生命中一段有意义的体验,即1915年台湾最后一次武装抗日起义被日军血腥镇压的历史性事件,史称“西来庵事件”(又叫“噍吧哖事件”)。史载:“日人血洗甲仙埔、噍吧哖等地,台胞被害者数千,被捕二千、被判死刑的多达八百六十六人。”^①屠杀造成台南县

^① 尹章义:《中国民族奋起运动与台湾的光复》,尹章义《台湾近代史论》,台北:自立晚报社1986年版,第33页。

玉井乡男丁丧尽的惨剧。杨逵以自己个人的记忆印证了台湾人民的这段痛苦记忆,他写道:

我亲眼从我家的门缝里窥看了日军从台南开往噍吧嘓的炮车轰隆而过,其后,又亲耳听到我大哥(当年十七岁)被日军抓去当军伕,替他们搬运军需时的所见所闻。其后,又从父老们听到过日军在噍吧嘓、南化、南庄一带所施的惨杀。每谈到“搜索”两个字都叫我生起了鸡皮疙瘩。所谓“搜索”就是戒严吧,站岗的日军每看到人影就开枪,一小队一小队地到每家每户,到山上树林里的草寮、岩窟去搜查,每看到人不是现场杀死,便是用铁丝捆起来;承认参加的则送到牢狱,不承认的便送到大坑边一个个斩首踢下去。到我稍大,在古书店买到一本《台湾匪志》,它所记载十多次的所谓“匪乱”,当然噍吧嘓事件也记载在里头,这才明白了统治者所写的“历史”是如何地把历史扭曲,也看出了暴政与义民的对照。我决心走上文学道路,就是想以小说的形式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①

1982年杨逵在接受访谈时再次回溯了这段个人经历,指出:1923年日本人秋泽乌川著《台湾匪志》一书中,西来庵事件的起义者“明明是对日本压迫政治的反抗,但在书中却被当做‘匪贼’来处理,我深感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我决心研读自己所喜欢的小说,并想藉小说创作,来矫正这被歪曲的历史”^②。

发生在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是台湾人民在辛亥革命影响下的一次可歌可泣的爱国抗日武装斗争,余清芳等人以宗教信仰为号召,广募党徒筹集经费,以各地“食菜堂”(斋教)为活动地点,鼓吹抗日,并发喻告文,提出“光复台湾”的口号。被殖民当局发觉后,即树起旗帜,率领大部分农民起义者,攻打甲仙埔、噍吧嘓,后被血腥镇压,被视为“匪贼”加以剿灭。这是

① 杨逵:《台湾文学对抗日运动的影响——十一年前一项文艺座谈会上的书面意见》,该文写于1974年10月,收入《杨逵全集》第十卷(诗文卷·下),台南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版,第388页。

② 戴国辉、若林正文:《台湾老社会运动家的回忆与展望——杨逵关于日本、台湾、中国大陆的谈话记录》,台湾《文季》第2卷第5期,1985年。

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的光荣一章。^①这与杨逵当年的印象和认识完全吻合。杨逵将个人历史记忆与在场体验不断铭刻与再现,正是对殖民者历史霸权叙事的不懈解构。而杨逵的创作,如他自己所说:“描写台湾人民的辛酸血泪生活,而对殖民残酷统治抗议,自然就成为我所最关心的主题。”^②

(二) 殖民地儿女的悲哀、愤怒与抗争:日据时期杨逵的小说题旨

日本治台半个世纪,全面实行严酷的殖民统治。在政治上,殖民当局实行政治、军事、立法三权一身的专制独裁制军人统治,即使1919年后改为文官总督,也并未改其专制独裁的“武治”性质;在经济上,殖民者奠定产业振兴为殖民政策之中心,抑制本地民间资本的活动空间,使台湾稻米和蔗糖生产的绝大份额掌握在日本财团手中。一战之后台湾存在的“米糖相克”矛盾,实际反映的也是台湾农民利益与日本糖业资本利益之间的冲突。^③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本质矛盾是日本殖民统治与台湾民众抗争之间的矛盾,在经济矛盾和阶级对立的背后,主导冲突仍是殖民与非/反殖民的民族矛盾。在这种社会现实中,台湾的民族运动与阶级反抗运动常常呈现出二而为一的形态。身为民族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左翼作家,杨逵对台湾社会的矛盾实质有着敏锐认知,他作品中的反殖民意识与社会阶级分析视阈紧密相关。五十年的日本统治,是假借一视同仁、日台同化的精神驯化,将经济社会的差别状态掩饰,并削弱民众抵抗的意志,或以利诱欺骗,而把它们塑造为顺从的“皇民”的历史。^④对于殖民者的历史叙事而言,杨逵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另类记忆”:殖民地的庶民记忆。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作者当时发表作品只能用殖民宗主国的语言:日语,也因其作品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而遭到过禁刊,可以想象这种反抗性的“另类记忆”的书写之艰难,但可贵的是,杨逵在可能的限度里以殖民地儿女的悲哀、愤怒与抗争为自己的文学创作题旨,坚持不懈

① 参阅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九州图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3页。

② 杨逵:《台湾文学对抗日运动的影响——十一年前一项文艺座谈会上的书面意见》,《杨逵全集》第十卷(诗文卷·下),台南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版,第388页。

③ 参看刘登翰《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闽台文化关系论纲》一书中的相关分析,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63页。

④ 王晓波:《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台北:帕米尔书店1985年版,第211页。

地为台湾历史留下一份充满苦难和抗争意识的珍贵记录。

杨逵日据时期的创作,大多含有以庶民记忆解构与颠覆日本殖民叙事的意味。《送报夫》《鹅妈妈出嫁》《模范村》《蕃仔鸡》《死》《难产》《泥娃娃》等作品,从不同角度记录底层被殖民者的苦难经验和深沉悲哀:《送报夫》里,台湾青年杨君的父亲因不愿贱卖土地给日本制糖会社而被活活打死,弟弟妹妹饿死,母亲自杀;小说《死》,写贫苦农民阿达叔不堪日本殖民者与地主的合力压迫而卧轨自杀;《无医村》里,穷人得了瘟病无钱医治只能等死;《蕃仔鸡》里,台湾女孩素珠给日本老板当下女却被老板强奸,不敢将真相告诉亲人而上吊身亡;《难产》中,可怜的孩子因为营养不良而导致眼球腐烂……杨逵小说从底层的生活经验出发,真实描绘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台湾庶民阶层的苦难图景。

《送报夫》是杨逵的成名之作,以日文写于1932年,在《台湾新民报》连载,但后半部分被官宪查禁。1934年方全文刊发于东京的《文学评论》并获奖,1935年,大陆左翼作家胡风将《送报夫》译成中文,刊于上海的《世界知识》,后又收入《弱小民族小说选》和《朝鲜台湾短篇集》,这是20世纪30年代两岸左翼文学值得一提的一次交流。30年代中期胡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既强调民族抗争也倡导大众文学,与杨逵的文学观念可谓不谋而合;而胡风文艺思想中的“主观战斗精神”也与杨逵文学的“统一的意志”颇有些近似。^①但《送报夫》在台湾仍被查禁。可见,作品尖锐的现实批判精神触怒了殖民者。作者笔下,殖民统治下台湾乡土社会现实黯淡而冷酷,殖民地农民在地主和殖民主双重的压榨下,正在地狱般的处境中挣扎、死亡。杨君的父亲在顽强抗争后被折磨而死,母亲断绝了与替殖民政权当巡查的杨君大哥的关系,弟妹们不幸饿死,最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母亲也上吊而亡,昔日里平静的村庄到处是同胞不幸的冤魂和死亡的阴影。这殖民地现实惨状的描摹是对殖民统治有力的批判。小说还展

① 这里的“统一的意志”一说源自林载爵《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杨逵与钟理和之比较》一文,林文指出:“他(杨逵)就认为文学即是通过作者感情的传达,把读者的感情发展为意志,统一的意志。”参见余光中总编、李瑞腾主编:《1970—1989: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一)》,台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版,第279页。

现了殖民者和地主资本家以野蛮强权合力实施殖民统治与经济压迫的事实，作品叙述了制糖公司强制低价收购农民土地制造出惨不忍睹的人间悲剧。

……木村的警察分所主任，他一站到桌子上，就用了凛然的眼光望了一圈，于是大声地吼：

“……听说一部分人有‘阴谋’，对于这种‘非国民’我是决不宽恕的。……”

他的翻译是林巡查，和陈训导一样，把“阴谋”“非国民”“决不宽恕”说得特别重。大家又面面相觑了。

因为，对于怀过阴谋的余清风林少猫等的征伐，那血腥的情形还鲜明地留在大家的记忆里面。

“非国民”、“决不宽恕”这类字眼提示读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等级分明的位阶关系和强弱悬殊的对立关系；而所谓“阴谋”也就是余清风林少猫台湾武装抗日领袖被殖民者残忍杀害的血腥历史。老实的庶民被震慑得无奈顺从，但选择了反抗的父亲被定“阴谋首领”的罪名。

“拖出去，这个支那猪！”父亲被打得奄奄一息，“均匀整齐的父亲底脸歪起来了，一边脸颊肿得高高的，眼睛突了出来，额上满是疮子。……身上全是鹿一样的斑点。那以后，父亲全变了，一句都不开口。”

不久，父亲含恨死去。土地还是被制糖公司用远低于市场价的低价强行收购。父亲之名被置换成为“阴谋首领”的莫须有之罪名以及“支那猪”这样的低贱物，而被残酷折磨乃至消灭。其实，“被殖民者”这个身份就是殖民地人唯一的罪名。在这个情节里，现实中的父亲之死与历史记忆中的余清风林少猫之死，乡民们的隐忍和武装抗日被镇压后台湾民众的沉默，形成了发人深省的同构关系。30年代，杨逵的叙述显然固化了殖民地的悲惨现实和历史记忆，“父亲”身体上惨不忍睹的创伤，也正是铭刻在殖民地人民心灵的伤痕，在压抑和沉默中，人们可以感受到叙述者内心燃烧的愤怒烈火！

1935年小说《死》发表于《台湾新民报》，在杨逵的作品中，这篇运用了不少闽南方言的小说细致而矛盾的人物心理分析非常突出。主人公宽意